

摘要

税收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它既构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又是社会稳步发展和经济正常运转的基础。但是许多企业可能会通过开展避税相关活动来攫取自身利益，而这样做的后果是导致本应该属于国家的那部分税收被留在了企业内部，对国家税收事业造成不利影响。虽然国家加大了对企业纳税情况的监督力度，企业的避税行为仍然普遍存在。从微观上来说，企业过于冒险的税收规避行为可能会对企业的声誉和未来发展有负面影响，而从宏观上来说，这种避税对维护社会公平、推动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也是不利的。因此，企业避税也成为了公司治理领域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近年来，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在企业决策中的作用愈发受到学术研究的关注。本文利用我国长久以来广泛存在的博彩文化，考察其对当地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和检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管理层自利动机这两个作用渠道。本文首先回顾和整理了目前国内和国外与企业税收规避、博彩文化有一定关联性的研究文献，然后对企业税收规避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利用新制度主义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中相关的专业知识，对博彩文化如何影响企业避税进行理论层面的分析，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之后通过实证研究对研究假说进行检验。在实证部分，本文将 2008-2020 年我国上证和深证 A 股上市公司确定为实证研究样本，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用各省份人均彩票销售额衡量博彩文化，考察其与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当地的博彩文化会促进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即企业所在地的本土博彩文化越浓厚，企业的避税程度就越高。

（2）本文提出并检验了博彩文化对企业避税产生影响的机制，研究发现博彩文化会通过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和强化管理层的自利动机来提高企业的避税程度。（3）本文对样本企业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本文将样本企业分为两组，一组为国有企业，另一组为非国有企业样本，发现博彩文化对企业避税行为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中依然成立；在区分东部地区企业和中西部地区

企业样本后，发现博彩文化对企业避税的正向影响在东部企业样本中可能更加明显。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结论在学术研究和现实工作方面均有一定的意义：在学术研究方面，本文的研究补充和丰富了文化与企业避税关系的相关文献。本文从非正式制度出发，深入探讨了企业所在地博彩文化和企业税收规避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作用的产生机制，拓展了以往学者的研究。另一方面，本文在实践层面为税务工作的改进和企业治理的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提供了制约企业避税的新思路。

关键词：博彩文化；税收规避；风险偏好

Abstract

Taxation is an important tool of state macro-control, which constitutes both a major part of the state's fiscal revenue and the basis for steady social development and normal economic operation. However, many enterprises may carry out tax avoidance activities for self-interest purposes, thus the income that should have flowed from the enterprises to the state continues to remain in the enterprises, resulting in the loss of state revenue and adversely affecting the national taxation business.

In recent years, the role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such as culture in corporate decision making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cademic attention. Based on the long-standing and widespread gambling culture in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its influence on the extent of tax avoidance by local firms, and further explores and examines two channels of action, namely the level of corporate risk-taking and managers' self-interest motivation.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and organizes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gambling culture at home and abroad, then defines 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analyzes it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based on new institutionalism theory, principal-agent theory and top echelon theory to propose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of this paper, and then tests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through empirical studies. In the empirical part, this paper's target sample is China's listed corporate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ecurity market from year 2008 to 2020, constructs a fixed-effects model, measures gambling culture in terms of per capita lottery sales in each provinc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will be presented and policy suggestions mad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from this paper: (1) The local gambling culture will promote the tax avoidance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The stronger the local gambling culture in the enterprise's location,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tax

avoidance of the enterprise. (2) This paper proposes and tests th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gambling culture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finds that gambling culture increases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by raising the level of corporate risk-tak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self-interest motivation of managers. (3)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sample enterprises, and after further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state-owned and non-state-owned samples, it is found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gambling culture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still hold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fter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eastern and central-western samples, this paper found different things, that i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gambling culture and tax avoidance still exists and may become more stronger in eastern sample.

Keywords: Gambling Culture, Tax Avoidance, Risk Preference

目 录

摘 要	2
Abstract	4
1. 绪论	8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8
1.1.1 研究背景	8
1.1.2 研究意义	9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10
1.2.1 研究内容	10
1.2.2 研究方法	11
1.3 可能的创新点	11
2. 文献综述	13
2.1 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	13
2.1.1 公司层面	13
2.1.2 宏观市场环境层面	16
2.1.3 非正式制度因素	17
2.2 博彩文化相关研究	19
2.2.1 博彩行为的影响因素	19
2.2.2 博彩文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20
2.3 文献评述	21
3.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23
3.1 概念界定	23
3.2 相关理论基础	24
3.2.1 新制度主义理论	24
3.2.2 委托代理理论	25
3.2.3 高层梯队理论	26
3.3 研究假说	27
3.3.1 博彩文化与企业避税	27
3.3.2 博彩文化与企业避税——基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中介作用	29
3.3.3 博彩文化与企业避税——基于管理层自利动机的中介作用	31
4. 实证研究设计	33
4.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33

4.2 变量设计	33
4.2.1 被解释变量——企业避税	33
4.2.2 核心解释变量——博彩文化	34
4.2.3 中介变量	35
4.2.4 控制变量	36
4.3 模型设定	37
5. 研究结果与分析	39
5.1 描述性统计	39
5.2 相关性分析	40
5.3 基本结果分析	42
5.4 机制检验	44
5.4.1 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44
5.4.2 管理层自利动机	46
5.5 异质性分析	47
5.5.1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	47
5.5.2 东部地区企业与中西部地区企业	49
5.6 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51
5.6.1 工具变量模型分析	51
5.6.2 剔除金融危机期间的样本	52
5.6.3 控制地区税收征管强度	54
6. 结论与建议	57
6.1 研究结论	57
6.2 政策建议	57
6.3 研究不足	58
参考文献	59
后记	69
致谢	70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71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税收构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部分，而企业是财政税收的主要税源。苏辙，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也对此发表过这样的见解：“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世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¹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22年全年税务部门组织的税费收入为31.7万亿元，充分发挥出为国聚财的职能作用，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税费作为企业的一项强制性支出，最直接的影响是减少企业可用的现金流，给企业带来一定税负压力。而企业的税收规避活动可以帮助企业节省一部分税收支出，给企业提供现金流方面的好处，这使得企业的避税行为越来越普遍，但同时避税活动也让企业面临税务处罚和声誉受损的风险。

我国的税收管理制度还不健全，不同区域的税收政策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使得我国企业的税收规避问题更加突出。2017年的税务系统数据显示出，2012年到2017年，我国税务部门开展的反避税整治增加了税收2204.64亿元，在管理方面，利用对企业做出纳税风险提示等方式，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指导企业补齐税收1605.03亿元；在调查方面，税务部门共立案查处案件1048件，收回税额334.99亿元。而这只是一些在严格的避税整治活动中被发现的个别案例，由于企业的避税方式越来越复杂，避税的问题越来越难以被察觉。避税行为会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使得本该流向税务部门的现金流向了企业，对国家税务事业的发展非常不利，需要引起重视。

现有研究证明公司治理、管理层特征和制度环境等因素会影响企业避税行为，这些因素都属于正式制度的范畴。在企业避税的相关研究中，很少有研究考虑到非正式制度在企业税收规避中产生的影响。一般情况下，非正式制度包括宗教、文化、习俗和关系等因素。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一种补

¹ 出自苏辙，2008：《上皇帝书》，《苏轼全集》，中华书局。

充，同时也是一种制度制约。一个地区的文化会对该区域内的企业行为产生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发现文化可以补充解释企业的决策行为，但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文化（如方言、宗教和社会信任）对企业创新、并购和投资等行为的影响。目前，研究文化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少，且文化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影响的产生机制尚不明确。在此背景之下，本文把关注点放在博彩文化上，研究其对当地企业避税的具体影响及其影响机制。

1.1.2 研究意义

本文探讨博彩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于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在理论支撑和现实实践方面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首先，本文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从非正式制度角度对其关于企业行为的影响进行了补充和充实。正式制度如法律、规定等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非正式制度同样不可忽略，提供了正式制度发展起来的土壤，和正式制度一起对社会的发展进步发挥出积极推动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关注到非正式制度因素，特别是文化对于企业决策及管理层行为的影响。文化作为一种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在我国广阔的各地区存在着差异，因此对各地区的企业的创新、管理层决策、信息披露等行为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目前多数研究关注宗教、儒家文化、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而本文将关注点放在博彩文化上，拓展了文化与金融的有关研究。

其次，本文对我国企业避税动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充实和扩展。现有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企业避税行为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以及公司治理等内在因素对其避税行为的影响，而较少有研究关注企业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当地文化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因此，本文可以补充这方面的研究。本文认为博彩文化会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促进管理层的自利倾向等方式来提高企业的避税程度，补充了企业避税的研究维度。

最后，本文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详细分析了博彩文化对企业避税的原理和机制，丰富了博彩文化的相关研究。Kumar et al. (2011) 认为博彩和投机心理会对金融市场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比如对股票的交易规模、涨跌情况和波动幅度均有显著的影响；Adhikari 和 Agrawal (2016) 的

研究中指出：地方赌博倾向对企业的经营决定有一定的影响。尽管上述文献与本文探讨的博彩文化类似，但以上文献更侧重于当地的赌博和投机行为，并且采用地区的宗教相关数据来刻画人们的赌博偏好，而本文更多的是利用人们的博彩心理，使用当地人均彩票销售额这一指标来更好地刻画与赌博类似的博彩文化。并且，现有研究大多数是研究博彩文化对于企业行为（如企业创新、费用粘性、金融化等）的直接影响，但是管理层在企业日常运作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本文从管理层的角度出发，结合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强调博彩文化对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来解释企业避税的产生机制。

综上所述，本文聚焦于企业的避税行为，将博彩文化和企业避税两者放入同一框架中，并放到不同产权属性、不同地区上来进行考察，因而对博彩文化和企业避税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扩充。

在实际情况层面，本篇论文经过实证研究得出的结果和结论能够引起税务机构和企业对博彩文化这一环境因素的重视，为国家税务制度的完善和企业制定决策时补充新的角度，为企业的税收筹划提供现实支撑。避税行为具有负面作用，对于政府和企业来说，应当更加关注当地文化的影响，并采取有效对策。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1.2.1 研究内容

第一部分为绪论。本章包括对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具体阐述。

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本章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和归纳，将有关文献分成两大类：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和博彩文化，并对文献中的观点、方法、结论进行了总结和评述。

第三部分是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本章主要介绍新制度主义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和分析博彩文化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机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

第四部分为实证研究设计。该部分对样本选取、数据处理、变量设计、模型构建等进行详细说明。

第五部分为研究结果与分析。在回归分析前，本文先对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多重共线性检验，并分析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包括基础回归、内生性处理、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和机制检验。

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建议。本章总结论文实证部分的研究结果，并对政府部门的监管工作和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给出相关建议，反思和提出本文的不足之处。

1.2.2 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内容和目的，本文拟采用理论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博彩文化对企业避税的影响。

1. 理论分析法。在理论方面，本文整理并分析了与本文研究内容有关的理论基础，选取了与本文研究主题最切合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委托代理理论、高层梯队理论，利用这些理论并结合本文的研究进行分析，并且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作为实证研究的内容和方向。

2. 实证研究法。为了进行实证研究，本文选取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最开始的研究样本，然后设定筛选条件，以此对样本进行严格筛选；设计研究变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并通过多元回归、作用机制分析、内生性处理、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来验证研究假说，分析实证结果，得出研究结论。

1.3 可能的创新点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研究视角的创新。在以往的文献中，大多数都是研究宗教和儒家文化这些反对博彩行为的文化因素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本文从博彩文化这一新视角出发，研究其对企业避税可能存在的促进作用；（2）研究内容的创新。本文结合博彩文化相关的心理学文献，根据博彩文化反映出的心理特征，探究博彩文化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丰富和拓展

了研究的领域和内容。(3) 影响机制的创新。目前关于博彩文化的文献大多认为其主要通过企业的风险偏好这一路径来对企业决策产生影响, 本文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 认为博彩文化会影响到管理层个人的心理特征, 强化管理层自利动机, 并选取了合适的指标来衡量管理层的自利动机, 丰富了博彩文化对企业决策产生影响的机制。

2. 文献综述

2.1 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

关于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现有的研究从不同的研究层次、不同的理论角度进行了详细且深层次的探索。本文将其分为公司层面、宏观市场环境层面和非正式制度这三个部分，总体来说，公司层面的因素研究多于宏观市场环境层面和非正式制度因素的研究。

2.1.1 公司层面

目前关于影响企业避税的公司层面因素研究主要是在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拓展延伸，包括公司治理和利益相关者关系等等。其中公司治理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主要是从公司内部治理的管理层特征、高管激励机制、股权结构到外部治理的机构投资者和审计监督。

理论上，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抑制企业的避税动机，降低避税的激进程度。李成等（2016）关注到独立董事这一内部的公司治理机制，利用董事会各个成员之间的背景特征相似度，计算出企业内部联结程度，探究独立董事这一机制如何影响企业避税，结果表明，这种内部联结现象会导致企业更加激进的避税行为，这种负面作用的力度会随着避税程度的上升而下降。

公司治理是一种既包括股权结构、董事会制度、管理层激励等内在制度，又包括外部控制、法律环境、投资者权益保障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制度安排（白重恩等，2005）。孙伟艳和胡士集（2022）的实证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可以有效地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这主要是因为机构投资者持股可以显著地减少企业融资约束、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增强企业与外部投资者的信息透明度。邢斐等（2021）利用机构交叉持股这一外部治理类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机构交叉持股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提升治理水平和缓解融资约束是重要的影响渠道。已有学者同时选取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研究整体治理水平对企业避税的影响。代彬等（2016）将高管控制权和独立

审计分别作为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的代表，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企业高管控制权的增强会促进企业进行税收规避，这表明避税可能是高管寻租动机的具体体现；但是高质量的审计会提高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这表明它并不能有效地监督公司的治理。不同于内部与外部的区分方法，严若森等 (2018) 认为公司的治理可以被划分为企业主动治理和外部被动监督这两方面，考察公司治理水平和媒体关注这两种因素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可以抑制避税程度，而媒体关注可以增加避税行为被发现的风险、提高避税成本，从而减少避税活动的发生。

信息披露提供了市场投资者知晓企业发展现状的关键渠道，良好、全面的信息披露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企业避税作为一项具有被审查风险和声誉风险的活动，需要更加隐蔽的环境。当信息更加透明时，这种活动更容易被外部投资者发现，从而可以抑制管理层通过避税进行租金的转移 (Desai & Dharmapala, 2005)。已有学者试图从信息披露的角度来探究影响企业避税的因素。李青原和王露萌 (2019) 认为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是外部对公司进行评价的一个增量信息，从而使得企业很难进行避税，并且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和企业避税程度之间的这种负向关系，还发现这种作用在面临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更高的公司样本中更显著。李昊洋等 (2018) 认为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信息处理和专业优势，识别出隐藏的避税行为，并验证了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这种作用主要存在于无绝对控股股东的样本中。由于避税方式往往比较隐秘，容易触及法律法规的“灰色地带”，所以相对不透明的信息环境可以为企业的避税行为提供一个稳定、高效的执行环境和安全保证。于明洋等 (2022) 选取年报这一信息披露渠道，他们发现年报文本的复杂程度与企业税收规避之间有直接关系：管理层经常试图采用模糊文本信息的手段，以防止利益相关者发现企业存在着避税行为。

税收规避属于企业决策中的一部分，可以给企业带来好处。Hambrick 和 Mason 于 1984 年提出了高阶梯队理论，他们指出管理层的个体特点是影响公司战略取向与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管理层有动机从避税活动中攫取个人利益，所以管理层的个人特征与企业避税行为有着不可分

割的关系。Dyreng et al. (2010) 首次发现管理者个人对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随后更多学者开始探索企业避税中的“管理者效应”。目前，管理者个人层面的研究已经从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个人背景，如性别和职业经历，扩展到心理特征，如政治倾向 (Francis et al., 2016) 和过度自信 (王东清和杨华庆, 2019)。一方面，企业的避税激进程度会受到管理者应对风险的能力影响。谢建等 (2016) 指出管理能力越强的领导者会更加在意公司的声誉，减少避税等会对企业带来负面影响的高风险活动，同时实证研究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一假说：管理层越具有管理能力，企业避税的成本会随之提高，相应地，企业对于风险的接受程度会更低，从而抑制企业避税。李芳 (2022) 分析了多方面的高管特征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发现高管权力、过度自信会促进企业避税，而高管任期时长、拥有法律背景比例会抑制避税。另一方面，管理者对于风险的态度也可以影响避税行为。代彬等 (2017) 基于女性比男性有更强的道德意识和更高的风险厌恶程度，研究发现：女性高管能够抑制企业避税行为。潘孝珍和陈侨东 (2021) 认为拥有税收征管经历的企业管理者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企业的避税风险与费用，并且对企业履行纳税义务有更强的责任意识，更加重视企业的声誉，从而会更少地进行避税，最后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这种作用在税收征管力度大、金融市场化程度高、法律制度完善的情况下更明显。除了管理者对风险的态度和应对风险的能力之外，还有一些研究认为企业的避税行为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管理者个人身份的影响。李吉园等 (2020) 从 CEO 的家乡身份切入，通过研究发现拥有本地 CEO 的企业会更少地进行避税，并从家乡认同和寻租行为两个方面进行了解释。除此之外，管理者拥有某些特殊的身份也可能为其进行税收规避提供了便利渠道，比如罗党论和魏翥 (2012) 认为政治联系会导致企业主动利用这种联系来进行税收规避，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政治身份会产生避税效应的结论。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公司高管具有攫取私人利益的动机。高管在公司中可以获得显性和隐形的收益，显性的收益来自薪酬契约，而隐形收入则来源于管理者通过经营管理所获取的额外激励，如在职消费等。然而也有其他研究指出，高管也许不会仅仅满足于获得在职消费的好处。当对高管的业绩报

酬和激励低于同行业的平均水平时，高管可能会从其余途径实现自我激励。而避税作为一种不容易被发现的活动，极有可能成为高管攫取财富的隐藏手段。已有研究将避税的影响因素研究延伸到高管薪酬这一方面。陈冬和唐建新（2012）认为公司避税是管理者寻找机会谋取私利的一个途径，并且检验了高管薪酬与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薪酬越低，企业避税程度越高，这一关系在治理机制不完善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桂向国和李竹梅（201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如果高管实际到手的报酬能够覆盖其理论上应得的薪酬，就可以对高管的自利性进行约束，从而降低企业避税的激进程度。王一舒等（2020）探究货币报酬和股权激励这两种薪酬形式如何影响不同股权性质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发现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货币报酬与企业避税无关，股权激励与企业避税程度负相关，而非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货币薪酬、股权激励都和企业税收规避激进程度正相关，这主要是由国有、非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以及薪酬激励实施的方式不同所引起的。

还有一些研究把关注点放在高管兼任事件上，大多数研究都认为高管兼任会提高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李百兴和宋弋戈（2022）从理论上提出三点高管纵向兼并对税收规避产生影响的理由，分别是增强避税动机、扩大避税空间和提高对企业的风险容忍程度，并且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管纵向兼任会使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也会让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加严格，从而促进企业避税行为。由于已有研究发现 CEO 的相关特征不足以解释企业避税，赵乐和王木之（2022）研究财务总监这一身份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结果表明：当企业的财务总监同时担任董事时，企业避税程度会更高，这可以用财务总监兼任董事减轻了信息不对称程度、更会发现避税可能性来解释。

2.1.2 宏观市场环境层面

企业行为是对其所处的市场、政策和制度环境的一种响应和反应，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宏观环境层面去解释企业避税，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市场竞争、宏观政策和制度环境等。企业想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其面临着金融市场的融资约束，而这种资金方面的约束正好与企业避税有一定关联性，企业在面对外部融资束缚时，会期望用内部资金满足企业经营，由此就可能

更有目的性去进行税收规避（李辰颖等，2019），但金融市场的开放和自由对企业税收规避有抑制作用，“深港通”、“沪港通”等证券市场的开放，使得我国证券市场在改善信息环境的同时，也让企业开展税收规避变得更加不易，促使企业降低避税水平（范源源和李建军，2022）。

已有研究证实，外部的政策和制度环境也会对企业税收规避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政府的补助政策可以让企业为了以后能够获得优惠而在当下主动降低避税程度（邓博夫等，2019）；而税务部门实施严格的税收征管也会减少企业实施避税的空间，发挥出积极作用（汤晓建等，2021）；陈德球等（2016）通过研究发现：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变动，会造成政策上的不确定，从而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税收避税程度，当本地的税收征管强度较低时，这种关系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当地的制度环境方面，Atwood et al.（2012）对1995—2007年22个国家的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当本国税收制度更多地采用主流的税收制度、税收执法力度越大时，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会更少；刘慧龙和吴联生（2014）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政府治理质量和依法治理水平的提高，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也会随之提高，即避税程度越低。在市场竞争环境上，钟海燕和严倩（2017）发现在产品市场中，企业的避税行为与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在激烈的产品市场中，公司更倾向于采用积极的避税策略。宏观经济和政策的变化也会给企业的避税行为产生影响。陈冬等（2016）以国企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宏观经济周期变动对国企避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衰退时期，国企的避税程度降低，表现出明显的“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

2.1.3 非正式制度因素

非正式制度一般包括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生活习俗和社会关系等因素。非正式制度是一种对正式制度的补充，它在公司税收规避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遗憾的是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相对较少。随着各领域研究的拓展和交叉，当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企业避税的相关研究加入文化、习俗、社交等非正式制度元素进行考察。

心理因素方面，罗宏和曾永良（2018）发现当相同行业内的高管之间存

在着互相比现象时，企业更有可能进行避税活动。同时企业高管的过度自信心理可能会高估自己对于避税风险的规避能力，对于避税的开展过于乐观，因此会出现更强的避税倾向（王东清和杨华庆，2019）。

社会信任同样是一种非正式制度，也会影响企业税收规避。一个地区人们之间的信任可以发挥出社会资本作用，人们之间可以互相传递信息，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给避税带来更大的阻碍，从而减少避税倾向，对降低交易费用、减轻融资限制、限制企业的避税等都是有益的。张茵等（2017）以社会信任作为一种文化要素，探讨了在区域内形成的社会信任环境如何影响企业避税，结果表明，企业注册地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其避税行为就越激进，这说明了企业利用社会信任进行寻租的可能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权力更大的 CEO 受诚信品德的影响更深，企业避税水平会更低；同时，更高的信息透明度会抑制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陈富永和周兵（2021）发现地区内的社会信任可以有效地抑制企业的税收规避，并从融资约束视角和道德约束视角检验了其影响机制。

根据地理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越近的位置距离可以通过影响搜集和获取信息的成本来影响信息不对称程度。张敏等（2018）利用税务局与企业之间的地理位置数据，探究企业注册地与税务局所处位置之间的距离如何影响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结果表明：当两者的地理距离越近时，企业有更大的机会进行寻租，企业会具有更强的降低避税风险的能力，从而导致避税意愿更强烈。

从社会关系网络角度来看，当企业 CEO 的出生地与企业注册地一致时，CEO 会因为更深的家乡认同感而不愿意让企业采取避税活动（李吉园等，2020）；虽然银企关系提高了企业获得信贷的可能性、缓解企业的融资压力，但是银行对于企业潜在的偿债能力有严格规定，而税收规避可以给企业带来现金流方面的好处，从而让企业降低对外负债的水平，因而银行企业关系越密切，企业可能更会通过开展避税活动来提高表面上的偿债能力（曹越等，2017）；政治关联可以为企业提供“保护伞”，便于企业采取税收规避行为，因而提高企业的避税程度（李维安和徐业坤，2013；徐瑞兰，2021）。闫焕民和廖佳（2018）分析了 CEO 与 CFO 的关系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发现

两者之间存在校友关系提供了管理者之间共同谋取私利的渠道，会推动企业进行避税的动机。

2.2 博彩文化相关研究

一个地方特有的文化反映了该地区人们的心理特征，同时还会反作用于该地区企业的决策和个人的活动 (Guiso et al., 2015; Aggarwal et al., 2016)，这种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文化是影响经济主体认识与行为的重要形式。在不同的区域文化背景下，管理层的价值观与行为倾向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并表现在企业日常的管理决策中 (赵子乐和林建浩, 2019)。相关研究证实，宗教信仰、语言习惯、社会信任等地区层面的文化因素都会显著影响企业的投融资决策 (辛宇等, 2016; 潘越等, 2017)。博彩文化蕴含了冒险精神和风险偏好，我国的博彩文化基础深厚，最早的赌博活动从我国古代的周朝就有所记载了，在魏晋时期，赌博更是十分盛行。博彩文化作为地区文化氛围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逐渐得到学术研究的关注。

2.2.1 博彩行为的影响因素

社会经济水平和个人心理因素是影响博彩行为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可能还会影响彩票型股票的投资水平 (Kumar et al., 2009)，这表明博彩行为会受到客观条件和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目前社会学领域的文献已关注到影响博彩行为的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经济状况等。相对贫穷的人在购买彩票上的支出更多 (Rubenstein & Scafidi, 2002)，当他们的收入减少时，反而会更多的购买彩票 (Blalock et al., 2007)；男人、离异人群更容易购买彩票；年龄较小、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参与彩票购买的程度更高。已有的相关研究也发现了种族、宗教、社会因素会对人们的博彩行为产生影响，比如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群体参与彩票购买的比例更高 (Herring & Bledsoe, 1994)；耶稣教和天主教的教徒购买彩票的频率更高 (Grichting, 1986)；城市人的购彩比例比农村人更高。具有上述背景特点

的群体在金融市场上会更偏好投资彩票型股票，这表明具有博彩行为的个人在其他事件上也会存在着博彩心态，博彩对于人们的影响已经内化到心理层面上。目前国内研究主要是针对博彩行为的动机（曾韬，2018）和澳门博彩业的发展情况（林双凤，2012），对于博彩文化的研究相对较少。

2.2.2 博彩文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现有研究根据博彩文化反映出的风险偏好和冒险精神等特征，主要关注博彩文化对于企业高风险行为产生的影响，如投资行为、研发创新等。Manso（2011）通过研究发现当企业所处地区的博彩文化盛行时，企业投资的风险项目比例会更高。Chen et al.（2014）认为创新作为一项具有风险的活动，其特征是高风险和高收益，在博彩行为代表的冒险精神影响下，企业的创新水平会更高。对于博彩文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赵奇锋等（2018）得出了与上述相关研究相反的结论，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博彩文化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不利影响，并且这种不利影响主要作用于研发者创新意愿、企业研发投入与能力、人力资本积累等渠道。

根据现有的心理学文献，那些经常参加赌博的人对自己的好运抱有很大的信心，这使得他们总想要做一些高风险的事情。Ji et al.（2021）发现位于赌博偏好较强地区的公司会经历更大的股价崩盘风险，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赌博偏好使得长期受这种文化影响的管理层往往会隐瞒消极的消息，他们相信造成消极消息的不利局面会在短时间内扭转过来，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和更严格的外部监督可以抑制这种作用，并且赌博偏好通过激进的公司策略和投机性会计操作加剧股价崩盘风险。谢露等（2021）发现浓厚的博彩文化会提高企业费用粘性程度，这种现象更多地体现在管理层更加过度自信和公司治理水平更低的样本企业中。Xie et al.（2022）研究发现当地博彩文化与企业的债券收益率差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在经营波动性高、违约风险增加的公司中，这种关系更为显著。博彩行为导致的乐观预期也让人们在面临不确定时通常表现出更强的冒险倾向，强化了冒险意愿，Doukas 和 Zhang（2013）发现博彩文化会导致更加频繁的企业并购事件。Qian 和 Wu（2021）发现当地

博彩偏好导致银行较高的风险承担水平，这和博彩文化的冒险性质有关。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关注了博彩文化对股价波动、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博彩文化和金融市场普遍存在的投机心理有一定关联性，而投机心理是促成交易达成的重要心理因素，对于金融市场非常重要。金融市场上的投资和交易活动一般都与大交易规模、强波动性和低收益有关 (Grinblatt & Keloharju, 2009; Dorn & Sengmueller, 2009)。Barberis 和 Huang (2008) 认为如果企业更倾向于满足目标投资者的过于旺盛的投机心理，将会造成 IPO 出现溢价现象。同样地，Kumar et al. (2009) 发现当企业所在地区的天主教与新教氛围更加浓厚时，该地区的博彩倾向更重，IPO 后首日收益会更高。除此之外，博彩文化还会影响彩票型股票的收益情况，具有博彩心理的股票投资者为了获得可能存在的超高收益，可以忍受平时较低的收益，因此这种类型的股票平均收益一般较低。

2.3 文献评述

已有研究发现，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与企业财务状况、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研究总体上都是在探究企业内部和外部的正式制度设定会对企业避税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无法解释企业的避税行为在地域上的差异。目前对于影响企业避税的外部文化因素研究相对较少，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目前的研究很少关注到文化在企业行为中的作用，二是很难找到可以客观、准确地测量出文化的指标。对于企业避税，不应该忽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企业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通过供应商、客户、政府等主体来与周围环境产生联系。当地的文化环境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企业的决策行为。近年来的研究开始探索地区环境在企业避税中的作用 (Hasan et al., 2017)。博彩文化作为地区环境因素之一，也会对企业行为造成影响，比如博彩文化对企业创新 (Adhikari & Agrawal, 2016) 和审计费用 (Callen & Fang, 2020) 均具有正向影响。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文化等非正式制度进行了许多探讨。与国内的研究相比，国外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具有负面色彩文化的效应，例如赌博、腐败等。与此不同的是，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更多地放在宗教信仰、社会信任、

老乡关系、家乡效应等相对更加积极的文化上。国内现有的企业避税相关文献也主要关注对企业避税有抑制作用的环境和文化因素，比如本土宗教（张明等，2021）和儒家文化（程博等，2020）等。与国内的这些文献不同，本文以中国独特的文化环境为切入点，研究具有消极倾向的博彩文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博彩反映了人们的冒险精神和投机心理。目前也已经有研究发现博彩文化对企业的财务违规（王菁华，2021）、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罗党论等，2021）等冒险行为具有推动作用，但鲜有文献将研究拓展到企业避税这一行为上。因此，博彩文化对企业避税有何影响值得研究。

3.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3.1 概念界定

本部分对企业税收规避的相关概念做出界定说明。目前学术界未对企业避税或者激进型避税的定义形成共识。Hanlon 和 Heitzman (2010) 的研究把企业的税收规避定义为一系列旨在降低公司应纳税额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包括税收减免，而且还包括企业主动采取的一些税收计划。Dyreng et al. (2008) 认为避税与逃税存在不同，他将避税行为视为位于完全遵守税法 and 完全背离税法这两种极端情况中间的一种行为。杨默如 (2010) 认为“税收筹划”与“避税”存在差异，指出避税有悖于国家税收政策的初衷，减少了税收资源，是在合法与违法中间的“灰色地带”。

虽然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避税和逃税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即避税合法、逃税违法，但是在现实中，两者的界限并不清晰。在实际情况中，掌握合法与非法的尺度是非常困难的。更关键的是，由于税法的调整一般都滞后于现实的经济活动，这就导致税法缺位于新产生的应纳税行为，或者税法本身的规定存在界定模糊的地方。因此，在实际情况中，逃税与避税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 (Slemrod, 2002)，在学术上也难以进行区分，现有的文献往往没有明确地区分逃税和避税。鉴于在实际情况中难以区分二者，学者们将其统一归类为企业税收激进行为 (金鑫和雷光勇, 2011)。在国内关于企业避税的相关研究中，绝大部分文献都没有对逃税和避税进行严格区分，只是在文字表述中存在着逃税 (田彬彬和范子英, 2018) 和避税 (范子英和田彬彬, 2013) 的区别，另外有一些研究使用了更为中立的表达方式，比如税务违规和税收激进。

税收规避是一种具有双面性的行为。适度的税收规避可以提高税后利润、给股东创造财富、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时也能提高公司的财务表现和价值 (Desai & Dharmapala, 2005)。虽然开展税收规避活动可以改善企业的业绩表现，吸引潜在投资者，但过度的税收规避行为不仅会给企业带来风险，

还可能被公司管理层用来攫取私人利益，影响税收的公平性、降低国家税收资源的配置效率（金鑫和雷光勇，2011）。除此之外，如果企业的避税行为实质上违反了国家的税收制度，会导致企业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如果企业采用了过于激进的避税策略，税务机关的税务稽查就有可能对其进行税务处罚，从而造成审计风险，这不但会影响公司的盈利，还会对企业的信誉和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积极的税收策略可能需要降低企业信息的透明度，而公司透明度的降低可能会引来监管部门的检查甚至处罚，比如证券交易所给出的问询函，甚至投资者会对不遵守披露义务的企业进行投诉，这不仅会引起负面的市场反应，还会影响企业及其管理人员的声誉。综上所述，过于激进的税收安排会给企业带来三种不同方面的风险：信息风险、代理风险和税务审查风险（Hasan et al., 2014）。

在本文的研究中，鉴于目前还无法对企业的避税行为进行更加明确的定义，并不对逃税和避税行为进行严格的区分，本文将税收规避定义为广义的避税，即一切能够降低企业税收负担的行为。

3.2 相关理论基础

3.2.1 新制度主义理论

在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制度的含义是观念、资本与规制，包括一套规则、组织、规范等。制度是一套将社会成员的不同行为捆绑在一起的规则，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用于规范社会行为、以正式的方式设置的制度安排，包括法律、政府规章、条约和规则等，一般具有明确详细的规定内容、执行程序 and 处罚措施。而非正式制度不是人为确立的，而是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包括传统民俗、道德伦理等，一般不具有强制性，而是靠个人精神道德和社会舆论进行柔性约束。虽然正式制度是更为规范化的成文规定，但在人们行为的规定约束体系中，非正式制度比正式制度有着更广泛的作用，在人们的行为决策中，更多的是非正式制度在发挥着决定作用。

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个人行为和企业决策不仅受到正式制度的制约和

约束，而且还受到非正式制度的间接影响，如道德规范和文化习俗（陈欣和陈德球，2021）。Alesina 和 Giuliano（2016）通过对文化和制度定义的梳理，认为文化就等同于非正式制度。文化是塑造人类行为的关键因素，是习俗、伦理等一系列人类活动的总和，属于非正式制度，但能够很好地规束人们的行为（姜付秀等，2015）。现有研究发现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于个体和组织的行为决策能够产生影响，如潘文东等（2022）发现如果一个家庭受到了儒家文化教育的影响，其银行存款和对不动产投资比例都会更高；Jin et al.（2017）发现当社会上的宗教规范氛围更加浓厚时，企业披露 CSR 缺陷也会更多。由此可见，诸如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等非正式制度确实对企业的决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此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切入对企业决策进行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选取博彩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进行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我国的博彩文化源远流长，与其他的传统民俗也有着深厚的联系，赛马、斗鸡、斗蛸蚶都是我国古代比较原始的博戏，赌博的花样也越来越丰富，汉朝流行“六博”、三国流行“樗蒲”、唐朝人玩“双陆”、宋代人掷骰子、明清盛行纸牌和麻将，这些活动都与博彩行为具有相似的性质，长期发展就形成了各地浓厚的博彩文化；其次，博彩行为具有社会性质，博彩这一行为反映出以小博大、短视、盲目乐观、勇于冒险等心理，购买彩票是博彩文化对个人决策的重要影响之一（Kahneman & Tversky, 2014），因此属于非正式制度之一的博彩文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可以明显地影响内部群体的态度和行为；最后，将博彩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来研究其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具有充足的理论和文献基础。现有的对于企业决策的影响已经拓展到管理层的个人特征上，大量文献讨论了管理层的背景、身份、心理特征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博彩文化营造了冒险和投机的地区环境氛围，也会对管理层个人产生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理论和文献基础。

3.2.2 委托代理理论

在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之下，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作为委托人的股东，其目标是让代理人对自己所拥有的资源进行管理从而实现

资源的最大收益，而代理人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追求的目标是私人利益的最大化，包括薪酬收入、闲暇时间、个人声誉等。在这种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之下，代理人采取的行为可能会与委托人的利益产生冲突，甚至会让企业面临破产的风险。

Desai 和 Dharmapala (2005) 在企业税收规避的研究中结合了委托代理理论，指出操作难度大、隐蔽的避税活动给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打开了实施渠道，因此产生了与避税相关的代理问题。为了保护避税活动的安全、不被监管方发现，企业会主动隐蔽公司的财务信息，降低信息透明度，用这种方式来使内部管理层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加严重，从而规避外部的税务监管，为管理层实施避税提供了机会和操作空间。另外，管理层可以通过开展避税活动来提高企业的税后利润，进而增加自己的薪酬待遇，因此管理层有足够的动机去开展高收益的避税活动。然而，避税活动的这种高收益也伴随着高风险，管理层采取的避税安排可能会让企业面临税务风险和声誉风险，进而影响企业整体的利益。

3.2.3 高层梯队理论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管理者的个人特征会显著影响其战略选择，进而影响企业的行为 (Hambrick & Mason, 1984)。面对复杂的外部情景和信息，管理者作为有边界的理性人，不可能准确预测和控制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的所有情况，他们只能利用自己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做出影响企业经济行为的战略选择。然而，目前很难直接观测和准确衡量管理者的心理特征和价值观。高层梯队理论认为，可以利用高管人员的人口学特征和背景经历，如性别、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生活经历等，来间接衡量高管团队的心理结构和价值观。

管理者的特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人口学特征，可以直接从高管背景资料中的人口学数据中获取；二是心理学特征，主要指难以刻画的个人的正负面情绪等特征；三是权力特征，即个人拥有的职位高低和权力大小；四是环境特质，主要指管理者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个人特征。本文选取的博彩文化主要影响企业管理者的心理特征。一个地区的博彩文化会对

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们的心理结构和观念等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根据已有的心理学相关文献，博彩文化更加浓厚的地区，人们往往更加不关心社会公益、更不在乎声誉、有更高的风险偏好程度。这些特征影响了该地区企业管理者的感知、学习、认知能力和风险偏好，以及他们的战略选择，而这些又进一步影响了他们做出的财务战略和决策。

3.3 研究假说

3.3.1 博彩文化与企业避税

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理论表明，消费会受到收入水平的制约，消费者的偏好影响着消费的方向。而消费者的偏好不仅与个人特征有关，还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基于以上理论，可以得出消费者的偏好与社会文化有关的结论，也就是说，消费者的偏好隐含了背后的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又相应地打造了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相比于日常的消费品，博彩可以支出较低的成本，而可能的收益更高，存在着回馈和奖励机制，容易让人上瘾，更容易受到消费者个人的影响。因此，博彩的消费反映了消费者的偏好，也反映了社会文化环境。

博彩文化可以通过改变企业的纳税遵从程度来影响其避税行为。李大明和刘军（2011）对纳税遵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研究，他们发现：社会环境因素对纳税义务人的纳税遵从度存在一定的影响。根据现有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文献，在一个博彩文化氛围更加浓厚的地区，人们可能更加不关心社会公益、道德素质更低，如 Gupta 和 Derevensky（1998）指出大量的青少年赌博者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偷钱。博彩行为反映出人们冒险、激进、对非法行为的后果更加不关心等心理特征，在这样的心理影响下，人们可能更加不遵从纳税这一法定义务。对于企业来说，就可能表现为更多地进行避税。

博彩文化不仅会影响当地人们的心理态度，还会对企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Aggarwal et al., 2016）。区域文化可以通过管理者价值观、企业文化等间接渠道来影响企业的经营行为。目前的相关研究已经表明，一个地区的文化环境确实能够通过企业高管的观念、心理等渠道，作用于企业的经营管

理活动。一方面，管理者可能来自于企业的注册地或所在地；另一方面，管理者为了实现企业与当地之间的融合，也有可能主动适应并融入当地文化，所以管理者的态度、意识和心理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潘越等（2017）指出我国历经五千多年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区域文化，为文化与金融领域的交叉研究奠定了坚实又丰厚的基础。本文探讨的是企业所在地的博彩文化氛围对企业决策的影响，这是基于我国从古至今就广泛存在着博彩活动，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间的积累，博彩文化背后的特征已深入地影响着当地的人们。据 Sobrun 等人在 2012 年的报道，亚洲人由于其迷信和运气等文化信仰，更容易进行赌博。在亚洲人中，最容易受影响的种族是中国人，赌博似乎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文化。Chan et al. (2019) 的研究中也指出，博彩在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博彩本质特征是以小搏大，而彩票是基于概率的娱乐性游戏，也具有与博彩活动类似的性质。彩票是中国大陆唯一合法的带有赌博性质的获利渠道，经过多年不断的规范和发展，我国的彩票产业逐渐形成了规模化的发展趋势，所以本文利用彩票相关的数据来衡量各省份的博彩文化。图 3-1 显示了我国 2008 年-2020 年的彩票销售变动情况，由图可知，我国的彩票销售额逐年上升，博彩文化的基础深厚。图 3-2 显示了 2020 年中国 31 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的人均彩票销售状况，可以看出，我国各个省份的彩票销售情况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使得本文可以进行博彩文化与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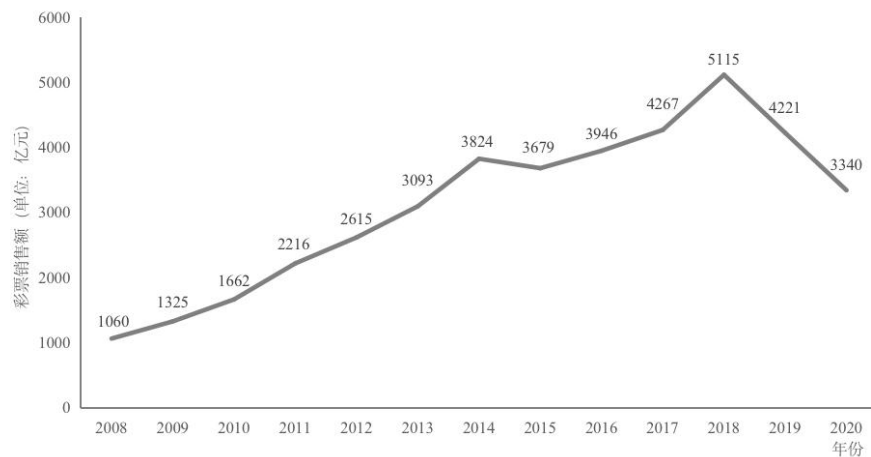


图 3-1 我国 2008-2020 年彩票销售额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CNRDS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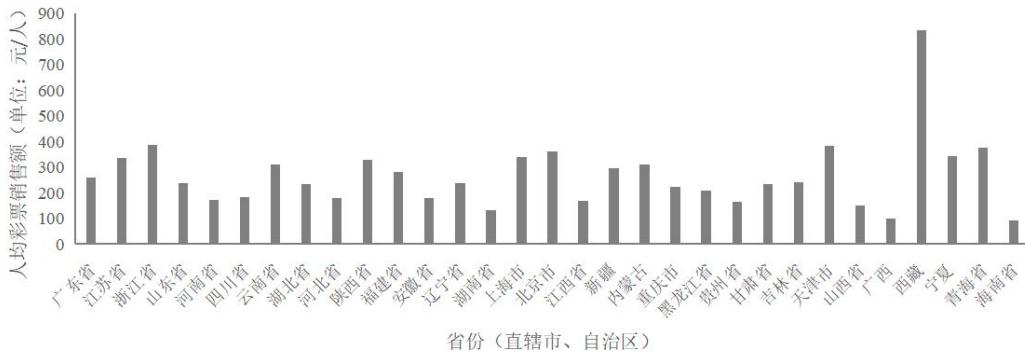


图 3-2 2020 年我国 31 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的人均彩票销售额

数据来源：CNRDS 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官网

根据文化嵌入理论，人们的行为和企业的决策都会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当一个企业面临着外部浓厚的博彩文化氛围时，管理者会受到这种浸染，可能会增加冒险的意愿，而这可能导致企业拥有更高的避税程度。同时，博彩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个人的风险偏好，还会通过组织内的联系来对其产生间接影响。在组织中，个人对风险的态度会受到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影响，Ahern et al. (2011) 发现，个人的风险态度会受到人际互动或同伴互动的影响，这说明当组织中的某些或者某个个体具有风险偏好倾向时，对该组织内的其他个体可能存在着辐射效应。当企业所处的地区拥有较为浓厚的博彩文化时，管理者和组织本身可能对风险的偏好程度更高，愿意去开展风险较高的避税活动，导致更高的避税程度。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博彩文化会提高当地企业的避税程度。

3.3.2 博彩文化与企业避税——基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中介作用

企业的风险承担代表了其追求巨额利益并且愿意为此支付一定成本的倾向，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风险承担意愿、风险承担水平、风险承担能力。大量事实表明，企业的战略决策往往基于对风险和回报的估计和权衡，而这种判断又是建立在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假设之上的。企业开展避税活动虽然面临着税务稽查风险和声誉风险，但企业基于对避税节省的现金流收益的认识，

可能会冒险进行避税活动。

本文认为，博彩文化可以通过强化企业的风险承担意愿或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从而促使企业开展避税活动。首先，博彩反映出人们本身内在的冒险倾向。许多研究证实了更加偏好赌博的人群对不确定事件更抱有乐观心态，因此会更容易去冒险 (Spurrier et al., 2015; Mishra et al., 2017)。当博彩文化更为浓烈时，人们的心理态度、价值观念受到影响，也可能会具有上述特征。而对于企业来说，内部的高管、员工和其他的相关人员都在浓厚的博彩文化环境中工作，都会不可避免地被博彩文化影响，他们会对风险持更加乐观的态度，风险偏好程度更高，导致判断和行为出现一定偏差，最后作用于企业的经营管理 (谢露等, 2021)。现有的相关研究表明，浓厚的外部博彩文化会导致管理层增加对更高风险项目的投资比例 (赵奇锋等, 2018)，企业更倾向于进行股权质押 (罗党论等, 2021)，也会有更多的企业并购事件 (Doukas & Zhang, 2013)，这些研究都表明博彩文化会促进管理者或企业的风险倾向。

在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众多因素中，文化价值观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Li et al. (2013) 发现，文化既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管理者作出的风险决策，也可以通过正式制度渠道来间接影响。结论表明，有着个人主义色彩的文化会推动企业的风险承担，而倾向于规避风险的文化 and 倡导和谐的价值观念会抑制企业的风险承担。避税行为已被公认为一项具有高风险的企业活动。由于博彩文化代表着冒险、激进和风险偏好，当企业所在地的博彩文化氛围更浓厚时，企业愿意为了避税活动的高收益而去承担高风险。博彩文化影响该地区企业管理者的风险态度，而管理者作为企业决策的制定者，其风险态度影响着企业的风险选择倾向性。因此，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是企业承担更高风险的结果体现。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 博彩文化会通过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来提高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

3.3.3 博彩文化与企业避税——基于管理层自利动机的中介作用

因避税而增加的公司全部价值并没有从国家转移到股东手中，其中有一部分流向了企业管理层。隐蔽而不易被发现的避税行为通常与企业管理层攫取个人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密切相关。Slemrod (2004) 研究了公司避税，发现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会导致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利益错位，即股东期望管理层将公司的价值和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管理的最终目标，而管理层为了获得个人利益，往往将管理目标设定为个人利益最大化，从而会想方设法利用自己的职权，在企业的日常活动中构造复杂的交易，寻找获取私人利益的机会和空间。

避税活动就是管理层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行为，他们利用税收筹划来创造复杂和不透明的交易行为，以减少税收成本，从而使私人利益最大化，避税活动是管理层自利的表现和结果。同时，根据企业避税的代理观和管理层模糊假说，追求个人利益的管理层还会通过复杂、具有迷惑性的避税手段来掩饰自己的其他投机行为（廖歆欣和刘运国，2016）。为约束企业管理层在避税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公司治理和制度设计方面进行了探讨，包括提高管理层的薪酬激励（Desai & Dharmapala, 2005）、引进机构投资者（Hanlon & Slemrod, 2008）、加强公开披露（陈旭东和王雪，2011）、完善国家和地区监管等（Wahab & Holland, 2012）。

Nooteboom et al. (1997) 指出人们是否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其程度与三个因素有关，分别是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激励和机会主义倾向。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不够完善、管理层拥有特殊身份和社会资本、外部的政策约束不够严格等因素都可以为管理层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提供空间。如前文分析，企业采取避税行为可以改善企业的财务业绩，给投资者带来信心，管理层也有可能因此而得到企业发放的业绩奖励（肖土盛等，2019）。避税活动可以为企业带来可观的收益，这为管理层进行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激励，足够吸引管理层冒险尝试。而本文研究的博彩文化，则增加了管理层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倾向。博彩行为与人们的投机心理具有很强的联系，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投机”是一种带有贬义意味的词语，它与试图不

劳而获，甚至是降低道德标准有关。博彩行为本身也反映了人们短视的心理特点，希望在短期内以较少的成本获得意外的较大收益。博彩和投机心理助长了人们想要通过隐瞒信息、躲避监管的方式来从避税中获取利益的心理，所以本文认为博彩文化促进了管理层采取避税等自利行为的动机和倾向。

避税行为背后隐藏着两种风险：税务稽查风险和声誉风险。如果企业暗中进行的避税行动被监管机构发现，可能要求企业偿还税款、缴纳罚款和利息等，这些成本的规模可能是巨大的。因此，进行避税的企业最终可能会上缴比他们试图通过避税节省的资金多出好几倍的罚款。Graham et al. (2013) 的研究中提到：69%的高管认为“避税对公司声誉存在潜在的损害”是不采取税收规划战略的一个原因，避税的声誉风险也可能体现为股价崩盘风险 (Kim et al., 2011) 和额外的融资成本 (Hasan et al., 2014) 等形式。因此，更关心企业声誉风险的管理层或企业会更少地进行避税。那么声誉和法律层面的担忧是否阻碍了所有企业的避税呢？与赌博相关的心理学文献表明：对于赌博的偏好营造了一种人们普遍忽视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的环境。在 Williams et al. (2011) 的研究中提到，赌博对于犯罪和欺诈行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赌博的人们往往会重复犯罪，他们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漠不关心，也不关心自己的危险行为或非法行为的声誉风险 (Meyer & Stadler, 1999)。Hermalin 和 Wallace (2001)、Fleischer (2007) 等人作为企业文化观的支持者，认为管理层之所以进行避税是出于自己的自利动机。由于博彩具有投机的性质，可以满足人们以小博大、以少胜多的贪婪心理，背后代表着博彩者追求利益的动机。因此，在博彩文化更加浓厚的地区，人们可能更加顾及自身的利益，具有强烈的“利己”动机，从而增加实施非法行为的内在冲动。在这样的文化影响下，人们的道德意识可能会更加薄弱，从而做出一些违背道德甚至法律的行为。对于企业而言，当管理层的道德意识较低时，他们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力也会降低，在面对那些可以给自身带来利益、具有诱惑力的机会时，管理层会具有较强的自利动机，从而采取那些可能有损企业整体利益的行为，比如企业避税。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3：博彩文化通过强化管理层的自利动机来提高企业的避税程度。

4. 实证研究设计

4.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将 2008-2020 年的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各省份彩票销售数据来自 CNRDS 数据库，各个省份的经济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各企业的财务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企业的名义所得税税率数据来自 Wind 数据库。

在对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后，为了避免样本中的极端值和异常值对本文研究产生的不利影响，让数据更加有效、结果更有说服力，本篇论文对最开始的研究样本做了以下处理：（1）剔除所有金融行业已上市的公司；（2）剔除股票代码中含有 ST、ST*、PT 字样的处于非正常经营下已上市的公司；（3）剔除扣税前利润和所得税费用为负的上市公司；（4）剔除关键数据缺失的样本。通过以上筛选步骤，本文最终获得了 19208 个非平衡面板数据。

为了减少样本中的极端数据对本文研究结果的不利影响，本文对连续型变量进行了 1%水平的 winsorize 缩尾处理。

4.2 变量设计

4.2.1 被解释变量——企业避税

由于已有的数据有限，无法对企业的避税意愿和动机进行更为具体的区分。目前国外的文献大多用实际税率来衡量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企业的避税程度越高，企业避税行为越严重，企业的实际税率就越低。但是我国出台了许多税收优惠政策，各企业也拥有不同的适用税率，如果直接使用实际税率来衡量企业避税会导致横向的不可比性。因此，本文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参考刘行和叶康涛（2013）的研究，使用了名义所得税率与实际所得税率（Effective Tax Rate）之差来度量企业避税。在采用实际税率的文献中，本文借鉴 Porcano（1986）、李青原和刘叶畅（2019）研究中的计算方法，计算

两个实际所得税率，即 $ETR1 = \text{所得税费用} / \text{息税前利润}$ ， $ETR2 = (\text{所得税费用} - \text{递延所得税费用}) / \text{息税前利润}$ 。然后计算本文的两个企业避税指标，分别为 $\text{Diff1} = \text{名义所得税率} - ETR1$ 、 $\text{Diff2} = \text{名义所得税率} - ETR2$ 。当这两个指标越高时，说明企业有更高的税收规避程度。

4.2.2 核心解释变量——博彩文化

本文研究的是博彩文化对企业避税的影响，而目前主要有两种类型的指标来衡量博彩文化。第一种是用当地宗教相关数据（主要是信徒比例）来衡量博彩文化，这种方法在国外的研究中更常用，在 Adhikari 和 Agrawal (2016) 的研究中，他们使用本地信奉新教与天主教的居民比例来对当地赌博偏好进行刻画，这主要是因为主流的宗教中一般都明确表示出对赌博行为的禁止，不同宗教也表现出对赌博行为不同的厌恶程度，但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我国，因为我国有宗教信仰的人只占少数，并不像国外那样普遍，宗教背景也和别国存在着差异。第二种是利用购买彩票来代表博彩行为，从而用彩票销售的相关数据来刻画博彩文化，这也是国内研究普遍采取的方法。从目前的研究看来，一部分学者通过彩票消费额与 GDP 的比值度量博彩文化，比如赵奇锋等 (2018)，还有一部分学者用人均彩票销售额来衡量博彩文化。本文参考盛明泉和丁锋 (2022) 的研究，利用各省份的人均彩票销售额数据来衡量当地的博彩文化，具体地，用“ $(\text{彩票销售额} / \text{当年年末常住人口数}) / 1000$ ”来表示博彩文化。如果人们在博彩上花费了更多的金额，那么就说明当地的博彩文化氛围更加浓厚。本文将企业所在地定义为企业成立时登记的注册地，然后从中提取出省份信息，将企业层面的数据与各省份彩票销售数据进行匹配，进而得到本文的基础数据。本文收集的彩票销售额数据均是省级层面的，这是由于数据的限制，目前数据库中的彩票销售额数据只统计到省级层面，还没有细化到省级以下层面。

之所以用彩票销售数据来反映博彩文化，是因为彩票的购买行为严格来说不属于人们出于理性思维而做出的投资行为，其实质上还是基于概率论的以较少的付出博取更大收益的赌博行为，反映出人们的冒险心理和风险偏好。我国的彩票业是为了特定的资金使用目的而向公众筹集的一种手段，而这种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898035077024006027>